

张闻天在神木的那些日子

■ 冉思尧

1942年,一个偶然的机缘,名义上仍负总责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在神木县逗留了43天。七十年后我们回望历史,赫然发现这段看似不起眼的经历,竟是张闻天人生的“节点”与“拐点”。在神木,他确立了“坚持基层调查,从实际出发”的信念,为建国后建设东北、反对“大跃进”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但同时,这也是他跻身中共权力核心的最后时光。从踏上神木那一刻起,张闻天的政治生涯已经由辉煌走向了没落。

一、山雨欲来时离开

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召开扩大会议,参加者连列席人员仅28人。从9月10日到10月22日,先后召开五次,集中讨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临时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这次会议是中共高级干部整风的开始。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明确指出党内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必须清算“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路线错误(即“左”倾路线)。由于张闻天曾是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成为会议主要批判对象。他诚恳接受批评,第一个检讨“我是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应当承认错误”,“我们的错误路线不破产,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便不能显示出来”。博古、王稼祥、李维汉等也都纷纷表态。不想王明坚持认为1931年的六届四中全会政治路线正确,他爆出重磅消息(博古、张闻天等人组成的临时中央非法)后,又突然宣布有病不再参加会议,“九月会议”只得结束。

随后整风在毛泽东的主持下顺利展开,但无果而终的会议及期间诸多插曲对其的刺激

是显而易见的。他一连写了几篇辛辣尖刻的文章批判张闻天,顾及影响才未发表,只给刘少奇等高级领导人看过。

其实中共中央还未立足陕北之前,毛和张就开始有了分歧。中央刚到陕北制定党的发展战略时,毛泽东提出“脱离陕北,占领太行山,然后向绥远发展,背靠内蒙”的建议引发激烈争议,众人大多不赞成,经张闻天拍板,最后否决了毛泽东的这一主张。边区政府建立后,两人又在文化建设上有歧见。1940年1月5日,张闻天为边区“文协”作报告时提出今后文化方向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天后毛泽东在“文协”演讲时基本沿用这一提法,仅作了微调。

而最让毛不满的,恐怕还是张闻天干预他和江青结婚。虽然党内许多老同志均不赞成,但中央里写信反对的却只有张闻天。以公家身份干预私事,难怪毛泽东读罢大怒:“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

于公不相谋,于私有罅隙,张闻天适时离开,亦算上策。他检讨自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



▲1942年9月16日张闻天与调查团的同志在神府彩林谷子地边。左起 雍文涛、曾彦修、尚明、刘英、马洪、张闻天、薛光军、许大远、徐羽

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决心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配合整风。经中央同意,1942年1月26日,张闻天率九名干部组成“延安农村调查团”,在杨尚昆、李富春等人的欢送中,从杨家岭出发了。

二、意外耽搁留神木

张闻天最初选的调查研究地区是晋西北,动身时所用化名即为“张晋西”。因为这里地处抗日前线,没有经过土地革命,实行的是减租减息、“四大动员”(即动员号召地主、富农和其他农民献金、献粮、献鞋和扩大军队)等政策,较陕北老根据地更有研究价值。

调查团经姚店、甘谷驿,过延川、清涧,2月2日到绥德。适逢三五九旅驻扎此地,旅长王震很敬重张闻天,特意腾出新婚窑洞让其入住。张闻天再三推辞,终被其诚挚打动,勉强答应。他还幽默地开了一个很文雅的玩笑:“维鹊有巢,维鸠居之。”

调查团在绥德休息了两天。期间张闻天多次和王震推心置腹地交谈。他具体分析日寇的致命弱点、细数国民党的腐败行径,高度评价八路军将士昂扬的战斗精神,坚信抗战必胜。对于自己三十年代犯过的错误,张闻天也并不



▲张闻天在山西兴县任家湾村调查时住过的地方

避讳。他还饶有兴味地提到自己对文学的偏爱(张闻天早年和文化人多有来往,也曾编辑杂志,发表新诗、话剧,翻译文论,还创作过长篇小说《旅途》),甚至表示重操旧业亦未尝不可。

王震注意到张闻天尽管谈得多,但态度真挚,不消沉。他想起在延安时有次和毛泽东谈话,毛说张不争权,于是把这番话转给了张闻天。张很高兴,连说:“这是对我的最好评价!”

两天后,调查团再度启程,于2月14日到达彩林村渡口。这个村子下辖于新设的神府县(现属于神木县)。该县由原神、府两县部分地区组成(神、府两县城被国民党控制),晋西区代管。队伍原本计划当天渡河,不想前线来报日军正在晋西北进行冬季“扫荡”。恰好这天是除夕,晋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送来白面。调查团干脆住下来,包饺子过年。

2月16日,晋西区党委书记林枫来访,向张闻天详细介绍了晋西北地区情况。次日,张决定改变计划,暂留陕北,先对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贺家川、孟家沟、贾家沟、阎家山、西山上、路家南窰、崔家峁)展开调查,预期一个月。其中雍文涛、薛光军负责阎家山,薛一平、曾彦修、许大远负责路家南窰,张闻天夫妇和马洪则负责贺家川。尚明、徐羽受中央财委所托执行其他任务,没有参加神府调查。

三、“检查我们的政策法规”

对于此次调查,张闻天后来总结道:“在开始调查前,应弄清楚调查的目的……调查研究是为了熟悉群众,检查我们的政策法规。”

各组紧张地展开调查,张闻天也不例外。他先找各阶层代表了解情况,上至县长毛凤翔、书记武开章、区长杨孝先、乡支书梁子义,下到“青救”队员贺怀德、少先队员贺仁禄、审判员高步功、孟家沟村干孟海贵、小商人贺长福、老人贺连升及若干党员和群众。又数次到农户、学校、商店、印刷厂走访,还下地研究土质、作物及产量,五次直接参与地方工作。

对于调查过程中所发现问题,张闻天及时给地方领导人建议。一次张带领组员参观集

市,发现公驴配种要价高昂,而这一行业却被视为“贱业”。他回来后即告诉县里同志,毛驴几乎是陕北唯一的畜力,用处极大,应打破旧观念,鼓励多养配种公驴,养的人多了,收费自然降低。

在进行调查的同时,张闻天又挤时间阅读相关论著。在神木一个来月时间,他先后读了韩德章的《浙西农村的借贷制度》、乔启明的《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的《浙江临安县农村调查》。这些学术著作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使其调查一开始就显得规范学理。

调查之余,他还积极指点地方领导人在理论方面的困惑。3月3日,张闻天和神府分委书记武开章等谈话时,集中解答了四个大问题。对于三三制政权中的党团问题,他强调“党团工作必须加强,党要尽到对党员的领导责任,在三三制政权组织中,党团的主要工作是如何运用民主的问题”;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能按照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何为政治家风度,他答道“根据实际情况来办事就是政治家的风度”;对于什么是党性,他指出“从实际中找出规律来办事就合乎党性”。

3月28日田野调查初步完结后,张闻天汇总各方资料,开始撰写《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4月12日写完。该报告共分四十六节,全面记述了八个自然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并附各种统计表格三十八张。5月18日即印就,送至延安毛泽东、中央书记处、中央党务研究室等处。

四、调查兴县又三次返回

4月1日,一二〇师司令部派作战股长来接。4月13日,结束神木调查的张闻天率团东渡黄河到达山西兴县任家湾。

在兴县稍事安顿后,4月19日,张闻天召集调查团工作人员座谈,总结神府调查经验,初步确定注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从实际出发、个别与一般结合的工作方法。次日张闻天

和晋西北区委商谈调查计划时,区党委也表现出强烈兴趣,要求加派干部参加。于是调查团增至四十余人,调查范围扩大到十四个自然村。4月22日,张闻天在碧村召开全体调查团成员会议,再次报告神府调查经验,让大家有法可依。

在兴县调查期间,张闻天还三次返回神木。第一次是5月16日,日军突袭兴县,张闻天所属调查团随晋西区党委和行署机关紧急撤离到神府县盘塘乡,21日入侵敌寇被消灭后才返回。6月25日因敌情关系,张闻天再度转移到盘塘,半夜又转至后杨家沟。这次所待时间最长,迟至7月20日才回任家湾。第三次是7月31日,因腹泻和牙痛回河东看病,8月4日即回。

返回神木期间,张闻天并没有闲着。他抽空探望了以前结识的贺家川老乡,参观了抗战



▲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在干部会议上讲话

日报社和印刷厂,向妇联组织部长张玉英了解本地减租斗争,还观看了本地风俗“祭龙王”,并在日记中感慨“老百姓缺乏什么,就弄个什么神”。当然,张闻天做得最多的还是整理调查材料,梳理土地租佃和阶级关系变动,并规定调查团每天晚饭后必须座谈土地问题中的一个问题。

7月1日,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21周年。为纪念党的生日,张闻天召集调查团全体成员连同驻村干部六七十人,于晚上七点在后杨家沟的打麦场上集会,发表讲话。他主要论述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无可比拟的伟大作用。虽然事后来看张的讲述有个别夸大成分,

但据曾彦修等回忆，当时皓月当空凉风轻拂，在壮美绝伦的高原景色下，张闻天用完全说理的方式，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大家深受感染，讲完后会场还久久不散。

五、落寞归来写“出发”

相比在神木心无旁骛作调查，张闻天在兴县则有些心神不宁。虽然他暂时远离延安权力中心，但多年身居高位，不可能不从细枝末节中感受到变化。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和中宣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两次演讲，标志着全党整风运动的开始。4月3日，在延各党政机关学校停止工作，全面进入整风学习。6月2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由毛泽东负总责，下面成立“分学委”。整风期间，“总学委”是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关。

“食洋不化”的留苏派是主要整风对象。张闻天留苏六年，理论素养极高，在旅莫留学生中有“教授”之称，自然首当其冲。

调查期间，张闻天和毛泽东函电来往六七次之多。可查信件内容，有两次是关于调查工作本身，还有一次则是探讨马列学院过去教育方针。事实上这件事已没有商量余地，因为毛泽东在信件中说：“关于过去马列学院方针是否错误问题，中央研究院已有人提出，凯丰、弼时意见待你回来时讨论，我觉不必等你，即指出是你错了……”张闻天当即复电：“不必待我回来”，“根据我最近一时期的考虑，我认为应该公开说，他是错误的……”其实，张闻天兼管马列学院时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党培养了宋平、邓力群、王光伟、田家英、曾彦修等大量优秀人才。建国后，他们几乎都是各领域内核心骨干。张闻天多次和夫人刘英感慨：“马列学院还是出了一批人啊！”

回顾张闻天主政时期，尽管早期犯“左”倾错误，但后期支持毛泽东回领导核心、反对张国焘逃跑分裂、主持陕北“肃反”平反、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等，成绩可圈可点，明显有别



▲ 1976年，张闻天与妻子刘英的合影

于其他留苏派。整风时只追究错误，他又怎能安心调查呢？

更让人难堪的是，调查结束后开会对晋西北区委干部进行报告，刚从延安参加整风回来的区党委书记林枫看也没看调查材料，就说“这一套东西完全要不得”。不仅如此，他还拒绝张闻天将调查团集合起来总结经验的建议，直接遣散了参与调查的晋西北同志。区区地方党委书记，敢拒不听从中央书记的要求建议，其底气怕还是来自延安的大“风向”。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后来回忆，“1943年3月，我们实际上是赶回了延安”。

1942年9月11日，张闻天一行离开兴县，在米脂、绥德等地调查数月。次年3月，接中央促返电报后回到延安。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张闻天离开书记处，任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委员会由刘少奇兼书记。

七天后，张闻天写出调查总结报告《出发归来记》。

（作者系陕西榆林市神木中学教师、文学硕士）

责任编辑：王封礼